

## 林義旭先生訪問紀錄

受訪時間：2013年11月7日，  
9：00-12：00

受訪地點：臺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林宅

訪談人：江志宏

紀錄：陳世芳



### 受難人資料

受難人/案件/判決書年齡	職業/經歷	刑期	與受訪者關係
林義旭 臺北市工作委員會案 28	臺北第二師範學院畢業 臺北縣三重國民學校教員	有期徒刑12年 褫奪公權7年	當事人
案情概況	林義旭先生，日治時代大正12年（1923）1月5日生於臺北，1950年5月13日，因「臺北市工作委員會案」，於所任教之三重國小被捕入獄，1964年6月5日出獄。		

### 家世與成長過程

我父親的名字叫做林清南<sup>1</sup>，他是日據時代國語學校畢業，這間學校就是第

<sup>1</sup> 永樂國校創於1896年7月，名為「日語傳習所」，因闢建延平北路，將原校地劃分為二，半為本校，稱為「第二公學校」；半為今日之太平國小，稱為第一公學校。1941年4月，改為臺北市永樂國民學校；1945年臺灣光復後，第一、二任校長為吳滄濤、葉土埔；1948年9月林清南校長（按：此人即林義旭先生的父親）到任；1968年8月改名為「臺北市延平區永樂國民小學」；1989年3月改為「臺北市大同區永樂國民小學」。參閱自臺北市大同區永樂國小全球資訊網，<http://xoops.ylps.tp.edu.tw/modules/tinyd0/index.php?id=1>，引用日期：2013年11月25日。

二師範的前身。我被抓的時候，父親是在永樂國小當校長，後來調去蓬萊國小當校長。父親是窮人出身，給人家當養子，有三個兒子。我在日本時代大正 12 年（1923）1 月 5 日出生，排行第二，我大哥是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畢業，後來在臺大醫院做醫生。弟弟也是醫生，是去日本當醫生，那時候他考入臺北成功中學，為了躲避當兵，就跑去日本念醫學校，讀官立的學校比較省錢，他後來可能是酒喝太多死掉了。

我在臺北太平公學校畢業後，考上臺北第二師範學院，那時候師範學校很難考。日本時代的師範不說是學院，而是師範學校，師範學校一切都是官費。小學畢業以後，大家都想考師範學校，師範如果考上，才有高等學校可唸。師範學校唸書除了不用錢外，畢業後還可以當官，做了教員可以戴一個金穗，另外還有配刀，帶著很威風。

師範學校很難考，一般來講都是一班挑四十個人，我那年只挑了三十五個，臺灣人只有十一個，其他都是日本人。我是念第二師範，第一師範都是日本人。<sup>2</sup>那時候的北部不是只有臺北而已，一直到新竹都算，實在非常難考。要做日本人的走狗，當然要選個好的、聽話的，我爸爸是當小學教員的，頭腦當然沒什麼問題。我師範學校唸到五年級時曾辦了休學。小時候就有點不願意被日本統治，後來這個政府來了我也不太願意。但是我後來看毛澤東自傳，也有青年去延安參加抗日，待遇差、吃得差、沒水洗澡，學生就會發牢騷，國民黨也是這樣，共產黨跟國民黨一樣。

我的大哥在臺大醫院當醫生，我出來之後，他親口跟我說，他老婆是信基督教的，所以他要和爸爸斷絕關係，我也知道他的意思，我被抓去就是共產黨，所以他不要我了，但是他不敢直接講，所以就說不認爸爸當爸爸了，也就是說不認我當弟弟的意思。這就是這樣的時代，大家都怕啦！我被抓去關了十四多年，原本判刑十二年，後來又多蹲了兩年，這期間都是我爸爸救濟我。我弟弟一直在日本，他也知道我被抓了，但他在日本娶老婆了。

---

<sup>2</sup> 林義旭先生在民國 87 年沈懷玉的訪問紀錄中曾提到日本人和臺灣人的差別待遇：「...在校常被欺負，畢業後的出路也是差別待遇，如日本人中學畢業在臺當教員，領的薪水多出臺灣人六成，種種不平等待遇及民族意識，醞釀了反日情緒，這也是被殖民者的悲哀。」有關資料詳參呂芳上主持，《戒嚴時期臺北地區政治案件相關人士口述歷史—白色恐怖事件查訪》（臺北：北市文獻會，1999），頁 17。

我父親後來在永樂國校擔任校長，<sup>3</sup>作了一首校歌，叫我拿去給音樂高級老師張彩湘<sup>4</sup>（後來擔任師範大學教授），請他修改、批評，他那時候在當音樂老師，他爸爸就是以前開發臺灣音樂的張福興<sup>5</sup>。去了他家，才發現張彩湘被抓走。張彩湘一直沒什麼政治色彩，為什麼會被抓我也覺得莫名其妙。這件事發生在我三重國校被捕前的幾個月，我也因為這件事被抓去拘留一天。在拘留室那一天並沒有受到刑求，也沒有多問我什麼，只是問我跟張彩湘是什麼關係，我說當時只是拿著校歌要去給他看，請他修改，和他都沒有什麼關係。

### 被逮捕前的社經狀況

我在七堵服務過一年，那時候我剛從第二師範畢業，大概是昭和 18 年（民國 32 年）的時候，但對那裡只剩下多雨的印象，那時候七堵那邊沒什麼發展，沒幾棟房子。光復後，就調回臺北市中山國小服務。

空襲的時候，一碗飯裡面三分之一都是南瓜<sup>6</sup>，臺灣出產米，但我們都吃這個，米都被日本人拿走。一碗飯裡面主要都是南瓜，那時候比較沒有大顆的南瓜，都是小顆的。剛光復的時候，蔣介石來臺灣佔用了學校給軍人住，小學也有，後來才知道那些軍人都是被抓來的。我在火燒島的時候認識一個兵仔，他是個工人，他說有一天早上正在吃油條的時候，就被抓去當兵了，後來也跟著到臺灣。那時候到處抓人當兵是有個原因，也就是說部隊編制有多少人，會有人來檢查人數，人數不足的時候就隨便抓人來湊數。

我在光復後去讀師範學院史地系<sup>7</sup>，讀書會是什麼人成立的我也不知道。那

<sup>3</sup> 任期從1948年9月至1952年4月止，後轉任蓬萊國小校長。參閱自永樂國小，「校史沿革」，<http://xoops.ylps.tp.edu.tw/modules/tinyd0/index.php?id=1>，引用日期：2013年12月7日。

<sup>4</sup> 張彩湘教授，1915年7月14日出生於苗栗頭份。父親張福興先生是臺灣早期樂壇開拓者之一，素有「近代臺灣第一位音樂家」之稱，是第一位以官費赴日學習西洋音樂的臺灣留學生。

<sup>5</sup> 張福興先生於1903年考取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因為音樂上的優異表現，獲得總督府的推薦以「官費生」身份前往東京留學。參閱自陳郁秀·孫芝君著，《張福興—近代臺灣第一位音樂家》（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01），頁83-88。1950年2月。另外，張彩湘教授因受友人呂赫若匪諜案牽連，遭警備總部拘押達一個月之久，後經父親張福興四處奔走，並由當時師範學院院長劉真出面具保，張彩湘教授使得獲釋。參閱自陳郁秀·孫芝君著，《張福興—近代臺灣第一位音樂家》，頁177。

<sup>6</sup> 一般都認為當時是飯裡都是加了很多地瓜，訪問時有特別向林義旭先生詢問，他肯定回答是南瓜。確認定稿時，又再次向林先生詢問，他非常肯定的說「是南瓜，也就是臺語說的金瓜」。

<sup>7</sup> 沈懷玉的訪問紀錄記載林義旭先生於民國35年9月上師範學院史地系。參閱自呂芳上主持，《戒嚴時期臺北地區政治案件相關人士口述歷史—白色恐怖事件查訪》，頁18。

裏都是學生，外省人、臺灣人都有。那時候說是介紹大家看《觀察》<sup>8</sup>雜誌，就看這個而已。《觀察》雜誌在上海出版，但是臺灣這裡好像很快就可以看到。那時候中國大陸都是這種類型的刊物比較多。當時《觀察》雜誌裡面有什麼文章，我已經不記得了。

為什麼參加讀書會會被抓去關，我也不知道。出來之後，聽以前日本時代第二師範的同學跟我說，我是被人家出賣的。出賣我的是我日本時代師範的同學，他就是靠著出賣我才能當校長。我們那時候讀書會總共有多少人我並不知道，我也沒在管，後來讀書會的成員是不是全部被抓走我也不知道。

二二八事件發生的時候，我並沒有親眼看到過。只有聽過那時候在北門那裏，有一臺卡車要開走，上面綁了一堆人，那些人都是普通人，只有聽到這個事情。卡車上有阿兵哥在上面。<sup>9</sup>

光復之後舊臺幣換新臺幣，四萬元換一元，老百姓的錢就這樣平白讓他們搶去，這一招很厲害，真好賺。臺灣人自己要站穩，馬英九政府，在美國經濟不好的時候，國民黨在美國的財團也會倒閉很多，那些財團多多少少都支持馬英九，臺灣人如果自己不站穩，被那些財團出賣，早晚會有饅頭早上十萬，下午三十萬的事情。

年輕的時候被日本政府管，後來我看日本的態勢遲早會敗，他們一直退守，退守到最後去沖繩，看起來就是要倒的樣子，我就叫我爸爸快點辦理辭職，退休金趕快領一領。沒想到日本政府一倒，換這個（國民黨）也一樣，我聽說宋美齡把美援資金汙掉。那時候一顆饅頭早上賣五萬元，晚上就變成十萬元，現在也差不多一樣。民進黨也沒出息，蘇貞昌風評不怎麼好，現在是國民

<sup>8</sup> 1946年9月1日創刊於上海，主編儲安平，是一份以自由主義為立場的刊物。1948年12月24日被國民黨以「攻擊政府，譏評國軍」，違反動員戡亂政策而下令查禁，並逮捕觀察社七位人士。1949年11月1日在北京復刊，改為半月刊，表示要以馬克思主義為立場，接受人民的批評、教育與改造，多寫所謂積極性、鼓舞性的文章，「站在文化的崗位上，按照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要求，為人民服務，為人民民主事業努力。」1950年5月16日後再被改組為《新觀察》，其「獨立的、客觀的、超黨派的」的編輯方針已不復存在，《觀察》前後總計出刊128期。參閱自陳永忠，〈《觀察》雜誌研究〉，《中國文化月刊》，307期（2006年7月），頁29-33、41-42。

<sup>9</sup> 林義旭先生對二二八事變的見聞不願多說，並表示他沒有親眼見過，但沈懷玉的訪問紀錄寫著：「...行經公賣局附近，見到憤怒的群眾正焚燒公賣局的菸酒洩憤。接著群眾轉移陣地，並有鑼鼓隊助陣，我也跟著走，到了新公園，群眾進到電臺廣播說：阿山打死我們臺灣人，大概廣播了十五分鐘左右，接著湧向行政長官公署。當時，剛光復不久，失業的人很多，滿街充斥著無所事事的人，因此遊行隊伍集結的很快。到了行政長官公署，已經是人潮洶湧，萬頭鑽動了。不久，就聽到機關槍掃射的槍聲。我機警的躲在茄冬樹後面.....。」參閱自呂芳上主持，《戒嚴時期臺北地區政治案件相關人士口述歷史—白色恐怖事件查訪》，頁18。另外，在確認定稿時，林義旭先生談及，二二八事件期間，曾和一位長輩赴嘉義竹崎進行武裝對抗。

黨的天下，以後的希望就看年輕人了。

馬克思的書我並不熟，以前年青的時候對共產黨抱有希望，對勞動價值、辯證法這些概念很有興趣，希望世界能因此改變，但是看來是沒有。最近連蘇聯都倒了，共產主義崩解，蘇聯是第一個走的，世界的民主主義成為世界潮流，臺灣還在跟他們（大陸）糾纏，臺灣人要站穩，年輕人要站穩，我差不多再一兩年而已了，就看你們這代了。

## 被逮捕和審判

我在民國 38 年調至三重國校當教員，民國 39 年 5 月 13 日那一天，我正準備要吃午飯的時候，兩個便衣來學校宿舍帶我走，我跟他們要求說可不可以等一下，讓我把學生的作業簿移交給同事。這是受日本教育的影響，做人就是要做到底，要有責任感。大家都是這樣，日本教育就是這樣，文化水準就像香港跟英國那樣，英國有那種好的制度。

在特務來到三重國校抓我之前，我完全不知道會被抓，他們一來就把我抓起來了，他們帶走我的時候，態度並沒有什麼特別。不過那時候我們都知道，對穿軍服的不能不小心，他們都有配槍。曾經有一個宜蘭人，一位叫做謝桂林<sup>10</sup>的醫生，有學過一點柔道，在被捕的過程中，將押解的特務摔倒，後來可能因為這樣被判了死刑。

那時候抓好多人，保密局<sup>11</sup>的獨房裡面關了二十幾個人，外省人和本省人都有。獨房是不是在地下室我並不知道，不知道在哪裡，我們都是被矇住眼睛帶下去，裡面只有一個小窗戶，吃的會從下面小洞送來，空氣非常差。空間只比我這裡的客廳還大一點點（按：林先生住家的客廳目測約 4 坪左右），因為人多，十分擁擠，晚上睡覺的時候，必須兩人兩人、腳交叉著腳睡覺，要不就得把腳收著，

<sup>10</sup> 謝桂林醫生應該是高雄鳳山人，在臺灣被槍殺，他有個弟弟謝桂芳，讀省立臺中農學院（今臺中中興大學），關在綠島得癌症過世。林義旭先生可能記憶有誤，把謝醫生記成是宜蘭人。

<sup>11</sup> 保密局是軍事情報局的前身，對日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於民國 35 年 5 月遷都南京，撤銷軍事委員會，成立國防部，同年 8 月，軍統局奉令改編成為國防部保密局，專責保密防諜工作，確保國家安全。民國 39 年 6 月，在臺灣恢復保密局正式編組，並於臺北士林芝山岩設立局本部，以持續執行國內保防工作及情報蒐集之重責大任。民國 44 年，我國情報機構改制，重新劃分任務，保密局改組為國防部情報局，原有保防偵查等業務，撥歸「司法行政部調查局」接管。民國 74 年 7 月 1 日，原情報局奉命與國防部特種情報室併編成立軍事情報局，隸屬國防部參謀本部，受參謀總長直接指揮。參閱自「中華民國國防部」官方網站，<http://www.mnd.gov.tw/publish.aspx?cnid=143&p=97>，引用日期：2013 年 11 月 25 日。

不能伸展。一個獨房裡面關二十幾個人，你想想就知道。地上有板子，晚上我們就直接睡。很多人在保密局那裏只吃鹹菜湯，胃腸受不了。裡面還關了一個他們的人，當抓耙仔，其中一個抓耙仔是做了壞事被抓進來，他一直抱怨說關太久，這麼久還不放，我們知道他是保密局的人。我在那裏差不多被關了一個多月，後來被轉移去高砂鐵工廠北所<sup>12</sup>，在大橋頭（臺北橋）那裏，這裡原來是辜顏碧霞的「高砂鐵工廠」，後來保密局因作家呂赫若<sup>13</sup>案逮捕了辜顏碧霞，把鐵工廠沒收後改為保密局的看守所。這裡的牢房比較大，有天早上出去的時候，我撿了一個罐子來當枕頭，這個還真難得咧！不然就沒枕頭了。

在高砂看守所那裡，有聽過辜顏碧霞也被關在那裏，但是看不到。<sup>14</sup>在高砂

<sup>12</sup> 陳英泰提到初入北所的印象：「保密局北所本來是開闊的廠房，一進去有用大木頭角材做為柵欄圍成的兩列大牢房，一個房大約有十坪大，離地面三十公分高處釘有木板地板。牢房最裡面放著一個馬桶，為大小便之用，我被放進乃四房，一進去有二十幾個穿著破舊藍色棉襖軍服的囚人擁擠坐著。」參閱自陳英泰著，《回憶：見證白色恐怖》（臺北：唐山出版社，2005），上冊，頁61。

<sup>13</sup> 呂赫若，本名呂石堆，臺中州豐原郡豐原街（今臺中縣豐原鎮潭子）人，1914年8月25日生。1922年進潭子公學校，1927年公學校畢業。1928年同時考上臺中一中與臺中師範學校，因經濟因素而選讀師範學校；1934年3月臺中師範學校演習科畢業，分發至新竹峨嵋公學校任訓導，與林雪絨結婚。1935年1月小說〈牛車〉刊載於日本《文學評論》第2卷第1號；4月轉調南投營盤公學校。1937年轉任潭子公學校。1939年3月攜眷赴東京學習音樂，進下八川圭祐研究所，師事聲樂家長坂好子，參加東寶劇團，演出「詩人與農夫」歌劇，有一年多的舞臺經驗。1942年5月3日因肺疾自日返臺，7月擔任《臺灣文學》的編輯，並擔任《興南新聞》記者。1943年1月進入興業統制會社工作，認識蘇玉蘭並且同居。4月29日與王井泉、張文環、林博秋、簡國賢、呂泉生籌組厚生演劇研究會，9月3日一連五天在臺北永樂座公演「闖雞」；11月13日以〈財子壽〉一文榮獲第二回臺灣文學賞。1944年8月任臺灣文學奉公會常務理事。日本戰敗投降，9月15日擔任三民主義青年團臺中分團籌備處股長。1946年1月擔任《人民導報》記者，2月第一篇中文小說〈戰爭的故事〉載於《政經報》，9月與蘇新、王白淵、孫萬枝、吳克泰、蔣時欽、蔡子民及周慶安在臺北創辦《自由報》周刊。1947年2月5日最後一篇中文小說〈冬夜〉載於《臺灣文化》，描寫中國接收臺灣後的經濟蕭條、民生凋弊與階級對立情形，文末是在一場混亂的槍響騷動中結束，預言月底二二八事件的發生。12月23日當選臺灣省藝術建設協會候補理事。1948年擔任建國中學音樂教師，加入臺灣省工作委員會，主編《光明報》。1949年2月擔任臺北第一女子中學音樂教師，並於中山堂舉行音樂演唱會；5月開設大安印刷廠，專門印製社會主義刊物與宣傳品；8月由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創辦的《光明報》被指控為共產黨的地下報紙，參與編輯的呂氏遂展開逃亡生涯，印刷廠則託辜顏碧霞代售。1950年2月在印刷廠被保密局埋伏的便衣特務扣押，因其持本名「呂石堆」的證件而逃過一劫。1951年據說在臺北縣石碇鄉附近的鹿窟被毒蛇咬傷，唯生死不明。11月17日保安司令部發表其為第一批尚未自首的潛匪人員。1991年2月前衛出版《呂赫若集》，被譽為「臺灣第一才子」。參閱自林至潔輯，〈呂赫若創作年表〉，《聯合文學》，第10卷第12期—總第120期（1994年10月），頁96-101。王建國，〈呂赫若生平暨寫作年表〉，《呂赫若小說研究與詮釋》（臺南，臺南市立圖書館，2002年12月），頁269-303。

<sup>14</sup> 林義旭先生在民國87年沈懷玉的訪問紀錄中曾提到：「保密局南所後來因為人滿為患，我們被移送設在高砂鐵工廠的北所。當時案子重大的仍留在南所。高砂鐵工廠原是辜家產業，辜岳甫遭霜辜顏碧霞因資助掩護涉鹿窟案的親共文學家呂赫若而遭沒收，並被判了七年徒刑，她也被關在自家鐵工廠的牢房。這裡的牢房比較大，可以躺著睡覺，我撿了個小罐子當枕頭。」參閱自呂芳上主持，《戒嚴時期臺北地區政治案件相關人士口述歷史—白色恐怖事件查訪》，頁19。

那邊也待了沒幾個月，當時我家就住在大橋頭那附近，也就是現在的臺北橋那裏，辜顏碧霞他們的工廠在那裏，她先生辜岳甫很早就因為肺病過世了。以前有一個人叫做高彩玉，是原住民，穿得很漂亮，我們在大橋頭那裡，租了三樓一間房子，從上面看下來，他有一個自家用的三輪車，不是三輪車是人力車。

由於我們的案情可能已經都清楚了，所以都沒被怎樣刑求、拷問。可是睡我旁邊一個老人，他是鐵路部的員工，是臺灣人，他後來被綁住兩手的大拇指吊起來，吊離地面一點點而已，這不用吊得太高，再吊高一點效果也是一樣。另外，曾經有人跟我說，審問人員會拿木板打犯人的腳，打到腳都腫起來，不能走路。我的案子可能是已經很清楚了，不必要打。我後來在火燒島上有看到人瘋了，但在保密局被審問的過程中不知道有沒有人瘋掉，連抓了哪些人來我都不知道。我不太記得在保密局或軍法處的時候有一個叫郭琇琮的醫生請人拿了三支菸給我，<sup>15</sup>我只剩下一點點印象，知道他好像是士林人，他在我參加的讀書會團體，算是頂頭的人，是個醫生，我那時候只是個學生，但也可能是一個目標，找到我是一個目標啦！我是不認識他，好像他太太也被關了十年的樣子。

在我要被送去火燒島之前，媽媽有來看過我一次。家裡人在見面之前，都不知道我去哪裡。連我被抓去的消息也不知道？後來在軍法處判決之前，就可以說了。<sup>16</sup>入獄之後，和外界一切都斷絕了，被判刑十多年，和那時候的學生都沒有再聯絡，而且在三重國校也沒有教很久，和三重國校的同事也全部都斷絕連絡了。我也不敢和他們連絡，不敢就是說自己怕會去害到別人，我如果跟你聯絡，那你不就是和我有關係。那個時代喔！這樣做會害到人。

像這種紅帽子的事情，大家都怕，不敢碰，所以也沒有碰到想要來幫忙

<sup>15</sup> 郭琇琮，臺北士林人，臺北一中畢業，1941年4月上臺北帝大醫學部，1944年與同學蔡忠恕在臺北帝大成立學生聯盟及反日組織，被日本憲兵逮捕，判刑5年，1945年獲釋，再入臺大完成學業。畢業後擔任臺大醫院外科醫生、醫學院講師，及衛生局防疫科長。1947年5月經由徐征介紹，認識蔡孝乾，1947年10月任臺北市工委會委員，1949年10月間，曾將臺灣省地圖及工作報告書交由林秋興帶往香港，1950年5月2日被捕，同年11月28日遭槍斃。參閱自《臺灣大百科全書》，沈懷玉撰稿，<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5658>，引用日期：2013年11月29日。在沈懷玉的訪問稿中，提到「在軍法處看守所時，同案郭琇琮透過外役曾寄來三支香煙。」參閱自前引書，呂芳上主持，《戒嚴時期臺北地區政治案件相關人士口述歷史—白色恐怖事件查訪》，頁19。

<sup>16</sup> 依照沈懷玉的訪問稿，林義旭先生於民國39年8月15日被移送軍法處，在軍法處待了一個月後，開過一次庭，於民國39年11月28日判決，林義旭被以「供認參加叛亂組織，並介紹他人加入」的罪名，判刑十二年，褫奪公權七年。判刑之後，於民國39年12月30日移送軍法處軍人監獄，此段時間才可以會面。參閱自前引書，呂芳上主持，《戒嚴時期臺北地區政治案件相關人士口述歷史—白色恐怖事件查訪》，頁19-20。但林先生對於在軍法處和軍人監獄那段時期的記憶，似乎已逐漸淡忘。

或是詐騙的人。紅帽子就是共產黨，我們那時候都這樣說的。剛抓去之後，大家的衣服都穿紅色的，不論男女，政治犯也是穿紅色的。我已經不記得那時候有沒有編號。

這也沒什麼意思，共產黨萬歲，共產黨現在也……。國民黨被大陸趕出來，跑到臺灣來，但是臺灣人就受罪了，他們來了之後二二八、白色恐怖，現在國民黨又跟共產黨合作，你說要怎麼辦？國民黨是被共產黨趕走的，沒地方去來到這裡。

我那時候並沒有參加共產黨，法官審問的時候，我說我是共產黨，法官就罵說，說自己是共產黨是要槍斃的。我那時候呆呆的，總覺得共產黨是很好的東西，但是我真的沒參加，還好那位承審的法官有特別強調要槍斃，這樣才救了我一命，那時候真的很傻。法官在審問時還問我，你說你是共產黨，那有沒有宣誓加入？我聽不懂什麼是宣誓，就說我沒有啦！那時候審問都說北京話，沒有人用日語，看那時候的狀況。我因為光復後在師範大學唸書，也當小學教員，所以北京話聽和說都沒什麼問題。

## 綠島和小琉球監禁時期

保密局抓去審完之後，被判刑的就送去火燒島。我在民國 40 年 5 月 16 日被帶到基隆等候坐船到綠島，那時候怕有人逃跑，就用繩索將五個人綁成一掛，並沒有帶手銬腳鐐，但是，光這樣大家就根本不能走了。<sup>17</sup>大家都是這樣，先送到基隆，再去火燒島。我說個很寶貴的材料，我們被送到基隆時，有個衛兵在顧著，這個衛兵剛好是臺灣人，他悄悄跟我們說，他參加過槍斃的過程，但是他本身有沒有槍斃人，還是只在旁邊看，我並不知道，他向我們比一比大姆指，說我們政治犯都很有勇氣。那時候很亂，很多賊仔都被槍斃掉，一下子就一百多個，但是政治犯和一般賊仔表現出來的就是不一樣，他們要被槍斃的時候會大聲喊萬歲，說共產黨萬歲，我們那個時代對共產黨存有一絲希望。有人被打了七、八槍才死，也有人一槍就死了，很偉大。

火燒島上有三個大隊，一個大隊有四個中隊，女生在第六中隊，一個中隊有

---

<sup>17</sup> 在沈懷玉的訪問稿中，林義旭先生表示是兩個人同銬一手銬，十人綁成一列。參閱自呂芳上主持，《戒嚴時期臺北地區政治案件相關人士口述歷史—白色恐怖事件查訪》，頁21。

一百二十幾個人。床有上下鋪，一格睡三個人。一格應該有比一個榻榻米大，三個人躺下去剛好。在火燒島上十幾年的時間裡面，他們安排了勞務活動和思想教育。我們一早起來，就被派去建築圍牆，我們不能離開這裡，還得自己去撿石頭作圍牆，就是自己蓋牆圍自己啦！後來我們也會蓋一些房子，可是颱風來的時候，有時候房子會整個翻掉。那裏的颱風很厲害，屋頂雖然用石塊壓住，還是會被風吹走。我們剛開始過去的時候，那裡蓋好的房子只有一兩棟，我們就先住在那裏，後來再繼續蓋別的房子。

那時候常常會請外國人來火燒島參觀，讓外界知道這裡是開放的，也有辦晚會給他們看。晚會主要是表演樂隊，說是樂隊，想也知道只有黑管兩隻、小喇叭也一兩隻、伸縮喇叭兩隻，其他就沒有了，後來才買了一臺小學用的風琴。火燒島這裡的犯人有的會吹鼓吹、吹喇叭，但是沒什麼人會編曲，所以後來就由我負責編曲，並擔任樂隊指揮。那時候在那麼寬的地方演奏，效果實在有限，可是大家聽了都稱讚說和聲出來了很好聽，可見得在這之前有多難聽。我後來自己學會了拉小提琴，是利用午睡的時候自己學著拉，但是我不會吹喇叭，因為我菸抽多了，氣管不好。

事實上，只有兩支喇叭能吹什麼？反正他們也聽不懂，於是我就大膽去編那首藍色多瑙河，因為這首樂曲是一節一節描寫多瑙河，我告訴演奏的人音樂就是這樣喔，他們過去都不知道，我就這樣教他們。但是那種爵士音樂，就沒辦法啦！他們沒辦法，我也沒辦法。爵士音樂是近代美國才流行的，有節奏感，以前一些世界有名的管弦樂團來臺灣表演，我每年都會去聽，現在都不太來了，因為沒人要去聽。不只沒人要去聽，也養不起，世界有名的樂團總要個百餘人吧！要養這些人沒有錢。

一年一度有運動會，要宣傳這裡不是集中營，這是對外開放的，也有播戲。另外還有戲劇表演，我不知道戲劇是不是裡面的人自己編的，不過演戲劇的外省人比較多。劇本可能是自己寫的，也可能是看外面的，戲劇主要演的內容就是反共抗俄。除了晚會，還有運動會，排球也有，足球也有，這些我都很愛，運動方面我都很喜歡。晚會跟運動會的表演都有外國人在看，因為這些活動就是為了他們才辦的，特別是美國人來參觀，就會辦晚會，也會加菜，就是要給他們看，綠島這個地方不是普通的集中營。唉！那裡都亂七八糟的。因為我們都被跟的緊緊的，所以不可能利用外國人來的時候去跟他們說些什麼或是抗議。

我有一次中午被派出公差，有一個國民政府的軍官，校尉以上的，不是穿兵仔的衣服，被關在一個籠子裡面，火燒島的日頭非常炙熱，這位軍官中午衣服穿得好好的，倒在那裏受罰，他們對自己人也是這樣。在那裡的時候，有一個學生後來瘋掉了，跟你說話的時候，眼睛不知道在看那裡，他最後跳海自殺了。睡在我隔壁的是個老人，好像是福州海軍那裡出身的，身體不好，甲狀腺有問題，長官同情他，讓他待在房子裡做事，不讓他出去爬山、做工，但是這樣他好像還是承受不了，最後也是上吊自殺。另外，還有一個，家裡人常來接見，他並沒有判多久，六、七年而已，最後被發現死在海上，有人看到後去報告，他到底怎麼死的也沒有人知道。

在火燒島，我們平常有在上思想課，上一些偉大的領袖、國父遺教什麼的；另外，還要去找茅桿、茅草，就是蓋住屋頂上的那種草，草得要從綠島的南港那邊扛過來，離我們被監禁的地方很遠，有夠累的，最後處長伯同情大家，才買了一臺牛車，這樣只要推就可以了，不然本來要扛去營區很累。處長伯是管理監獄的長官，平常對政治犯的態度也是客氣客氣的。有些兵仔也是被抓來的，上尉、上校這些軍官大都讀過書，但是軍官和兵仔都一樣，有好有壞。

在火燒島這邊，大家都穿一樣的衣服，做一樣的事情，有沒有抓耙子在裡面也不知道，一般來說，班長比較有可能啦！管理一班的班長是抓耙子的機會比較大。他們選來當班長的人比較聽他們的話。其實也沒什麼消息啦！沒什麼希望啦！都是憨牛啦！在那邊傻傻的做這樣子，外面什麼消息都沒有嘛！

楊達<sup>18</sup>那時候也在綠島，在那個時候，讀馬克思一樣也會被抓去。楊達到底

<sup>18</sup> 楊達，本名楊貴，臺南州大目降街（今臺南市新化區）人，1905年10月8日生。1921年3月新化公學校畢業，進糖業試驗所當臨時工。1922年考進臺南州立二中，1924年因不願與童媳結婚而赴日，1925年經過檢定後考入日本大學文學藝術專門科夜間部，以半工半讀方式維持學業。1927年9月東京記者聯盟機關誌《號外》刊出其處女作〈自由勞動者的生活剖面——怎麼辦才不會餓死呢？〉因參加朝鮮人的示威遊行而首次遭日警逮捕拘留，被退學而回臺參加農民運動。12月起草臺灣農民組合第一次大會宣言，並當選中央委員常務委員，遭日警第二次逮捕。1928年2月擔任臺灣農民組合特別行動隊竹林事件負責人，分別於竹山、小梅、朴子、麻豆、新化及中壢被捕下獄六次。受聘臺灣大眾時報記者，因竹林事件與簡吉意見不一而離開農民組合。1929年1月當選臺灣文化協會事務室中央委員會議長，2月12日因出席臺灣總工會而在文協臺南支部被捕，4月在新化與葉陶結婚。1930年參加臺灣自治聯盟。1932年改寫並擴充處女作為〈送報扶〉，經賴和而連載於5月19日至27日的《臺灣新民報》，僅刊出前半部，後半部遭查禁。1934年10月〈送報扶〉全文刊登東京《文學評論》，並入選該刊第二獎（首獎從缺）的殊榮。11月5日擔任張星建發行的《臺灣文藝》月刊日文欄編委。1936年1月與張星建因選稿意見不合而退出《臺灣文藝》，另外發刊《臺灣新文學》。1937年因當局禁止漢文，6月《臺灣新文學》停刊，前後共發行14期；6月赴日，7月7日因中日蘆溝橋事件而在東京本

有沒有念這些馬克思我是不知道啦！但是他有寫文章鼓勵臺灣人。楊逵後來被編在文化部，是作壁報的。楊逵這麼老了，後來運動會還在跟人家比賽馬拉松，讓我很欽佩，他堅持自己的主張，在火燒島還繼續寫，寫一樣的內容。

在火燒島上面，有那些有問題的兵仔，也有我們這種有問題的老百姓，有些人才十五、六歲。早期在火燒島那裏的女人，因為天氣太熱，所以都半裸，只穿褲子而已，火燒島嘛！後來那裏的兵仔曾經發生過強姦的事情，所以火燒島那裡的女人就不敢再半裸了，後來通通把衣服穿得好好的。早先火燒島是另一個世界，那裏的海也是非常漂亮。現在我已經 91 歲了，稍微有點癡呆症。我現在雖然是知道那個人，但是名字卻叫不出來了。當時那裏有醫學院的教授，有好幾個，也有一些外省的，「三寶」的很多，三寶的意思就是三流的。

還好有我爸爸在幫我，不然我沒錢，我在火燒島的時候，爸爸每個月寄一百塊給我。在火燒島那裏我有做過偷抽菸這種事，後來因為菸味很重被聞到，看守的就過來查，我就把還沒熄掉的菸藏在口袋裡，後來就聞到燒焦的味道。那時候，吃飽飯之後就去抽菸，我也會分人家抽點。看守的確實不容易抓到，菸一般都放在口袋裡，吃飽運動站在那裏抽，都沒有被抓到。可能是在火燒島抽菸的關係，後來氣管就變得很差，所以還是不要抽菸比較好。

民國 51 年 5 月，在我應該刑滿出獄前，我被移送到小琉球再關二年，多關二年的原因是說我在綠島都是在負責樂隊和打球，沒有吃過苦頭。在小琉球那

---

鄉旅館被捕，9 月由大勢新聞筆保釋才出獄。回臺後貧病交集，幸經日警入田春彥協助，開始經營首陽農園。1938 年 33 歲的人田春彥被控思想左傾，遭當局驅逐離臺之處分而自殺，遺書託楊逵代為料理其後事。1941 年 11 月 16 日與阿川燕城、小林洋、吳天賞、田中保男、張星建、藤原善三郎與巫永福在臺中成立中部文藝懇談會。1943 年 11 月 2 日與顏春福、張星建、巫永福組織臺中藝能奉公會，在臺北榮座以日語首演其蘇聯翻譯劇作《怒吼吧！中國》。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戰敗投降，將其農園改稱「一陽農場」，9 月 22 日在臺中創刊《一陽週報》，發刊至 12 月 9 日結束，總共發行 12 號。1946 年 5 月擔任臺中和平日報臺灣版副刊主編。1947 年 1 月發行《文化交流》，二二八事件爆發，4 月 12 日深夜與其妻葉陶雙雙被捕，關在臺北保安處，曾被判處死刑，8 月因當局態度改變而獲釋，總計入獄 105 天。1948 年 8 月擔任《力行報》副刊主編，組織臺灣中部文化界聯誼會，撰擬「和平宣言」，油印廿餘份寄友人斟酌修正。大公報記者從新生報副刊主任史習枚（歌雷）取得宣言，1949 年 1 月 21 日刊登在上海《大公報》第 2 版，因觸怒臺灣省主席陳誠，4 月 6 日被捕。1950 年 4 月 14 日保安司令部以「文字為有利於叛徒之宣傳」判刑 12 年，1951 年送綠島服刑。1961 年 4 月 6 日刑滿出獄，1962 年開始經營東海花園。1972 年復出文壇，參加臺北益壯會。1982 年 8 月 28 日應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之邀訪美，1983 年 11 月 17 日榮獲第六屆吳三連獎小說類，21 日再獲第一屆臺美基金會人才成就獎（人文科學）。1985 年 3 月 12 日凌晨五時在臺中逝世，享年 81 歲，安葬於東海花園。2001 年臺灣文學館出版《楊逵全集》14 冊。2005 年 11 月 27 日座落於臺南縣新化鎮的楊逵紀念館開館。參閱自秦賢次，〈臺灣老作家楊逵坎坷的一生〉，《傳記文學》，第 46 卷第 5 期=總第 276 期（1985 年 5 月），頁 69-71；巫永福，〈楊逵事略〉，《臺灣文藝》，第 172 期（2000 年 10 月），頁 17-21。

二年都是以勞動為主，不但比綠島更辛苦，也比綠島更不自由。我在小琉球那段時間，從來都沒有下過雨，總隊還曾經實施過限水，一個人一天只有三個水瓢的份量可以使用，就用這一點點水刷牙洗臉、洗澡和洗衣服，所以我們有時候會到海邊洗澡。民國 53 年 6 月 5 日，我終於獲釋。

## 出獄之後

我在 28、29 歲的時候被抓，關了 14 年，出來之後已經四十幾歲了，家人後來幫我介紹了我太太，她是個差不多四十歲的老處女。因為兩個人加起來歲數大，生了第一個孩子是正常的，第二個就有問題了，是個蒙古症，那時候也不知道蒙古症是什麼，後來聽說是男女細胞本來都應該有 46 個，細胞要分裂兩個才能有 46 個，老了分裂的時候不夠力，多出來一個，我們是 46 個，他 47 個，悲哀呀！很多人有這種情況，不是只有我，母體的身體不好，結合的時候不能遵守減數分裂，就發生病變了，照顧這個孩子，比把我抓去關在綠島還辛苦。

我從小琉球回來之後，就去跟我爸爸住，我大哥雖然是有錢人，但是並沒有照顧我。我太太是教員，賺不了多少錢，但後來又被倒了兩千多萬！好險這個時候有李登輝當總統，讓補償條例通過，我被判 12 年領了四百萬的補償金，多關的那兩年又賠四百萬，這八百萬救了我的命。

我從火燒島回來之後，主要以教學生彈琴維生<sup>19</sup>，我自己沒什麼學生，這些學生大部分是我太太去找來的，我太太是小學教員，學生裡以他親戚的孩子比較多。我沒有教什麼，只是教到大家會彈琴就好。我覺得英國的教科書比較好，比拜耳教科書更好、更高級一點，英國的教科書會教你音樂表現什麼，布穀鳥這首歌曲，「布穀、布穀」，這個曲子在表現什麼，這是我主要想教的。

音樂是我自修的。像是蕭邦的作品，一聽就知道是蕭邦，我後來就想說蕭邦的味道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就針對他的和聲跟編法研究看看，研究之後跟以前想的一樣，是沒有什麼特別的，他靠的是音感。我們普通人沒有絕對音感，

---

<sup>19</sup> 根據沈懷玉的訪問資料，林義旭先生出獄後，「先是在稻江教書，……在稻江教了三個月後，校長向我要五萬元紅包。當時我薪水一個月才一千多元，爲了紅包事，我辭職不幹。稻江的五萬元紅包應是藉口，真正的原因是我的政治背景，對校方而言是個燙手山芋。後來朋友親戚介紹我去做了一陣子翻砂工作，之後我當家庭教師，教鋼琴。」參閱自前引書，呂芳上主持，《戒嚴時期臺北地區政治案件相關人士口述歷史—白色恐怖事件查訪》，頁24。

研究和聲學，學著編曲，可是這個和聲學為什麼蕭邦有蕭邦的味道，因為他是天才，他有絕對的音感，什麼音和什麼音配合，各個音樂家都不一樣，可是他們基本上都有絕對音感，我需要什麼音拿出來編，這是一般人學不來的，他們有絕對音感。

日本時代的日本人也看到了這個問題，比如說汽車故障了，技師光聽聲音就知道哪個地方壞了，飛機空襲來了，空襲警報了，他聽聲音就知道這是哪一種飛機、高度怎樣。德國人更厲害，他們在屋內一聽就知道，日本人得要跑到外面去看。這兩種還是有差別，所以日本人後來知道音樂教育改革太慢了，這個不是一年兩年就可以達成。日本後來請德國希特勒的少年合唱團來表演，他們都是中學生，日本人試驗他們，發現這些團員都有絕對音感，就算沒有鋼琴伴奏，照樣合唱，而且一下子就唱出來了，低音高音他自己知道，所以沒有鋼琴伴奏也是一下子就唱出來。這個差別很關鍵，人家的教育跟日本的教育不一樣，所以日本末期、已經是戰爭末期，才來改變音樂教育，要培養絕對音感，但已經太慢了。

我因為對音樂有興趣，所以那時候都自己學，自己彈琴編曲，可是我沒有絕對音感。我從火燒島出來之後，跟朋友去聽音樂會，表演的是臺灣的管弦樂團，省的管弦樂團，有大鼓、中鼓、小鼓，一個人彈奏的，我聽得出來那個音不對，我那個朋友，也是在高中教音樂的，他問我說是那一個音，我就指出來那個音，後來證明我說對了，就請樂手調那個音。臺灣的鼓手也不錯啦！他知道是那個音不對，可是我朋友聽不出來，他擔任音樂老師也聽不出來。不過，我沒有絕對音感，音樂教育還是要養成絕對音感才好。

如果有絕對音感的話，就可以聽出蕭邦的和聲、編曲差不多一樣，但是風格不一樣，一聽就知道是蕭邦所作的曲子。蕭邦的曲子女人特別喜歡聽。所以說教育真的很要緊，經過訓練具有絕對音感，一聽就可以知道汽車那個地方壞了，不用再其他儀器慢慢去檢查。

之前被抓的時候，心裡面並沒有覺得很恨、很氣或是害怕，在一切都沒辦法的情況下，只好隨他去，命運啦！這是生做中國人的命運。要怨誰呢？只能怨說我們生在這樣的年代，要受到這樣的折磨。日本時代也是一樣，看到日本人，就說日本天皇萬歲，光復後就說蔣介石萬歲。不過，比較起來，生活水準方面，日本人比較高，他們人比較規矩，雖然是統治者，但對我們還有一個法

律的基準，國民政府的就沒有，他們的生活環境很差，但是這要怨誰？現在日本的資本也去中國投資，結果造成環境破壞，一些百姓得了什麼病？後來又跑去印尼，郭臺銘的資金也轉去印尼，大陸不能待了。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喝過，我小時候喝過自來水，但是他們沒有，全村都因為環境汙染得了病，那個什麼郭臺銘的轉去投資印尼。印尼這幾年也是下大雨、淹大水。日本人過去為了開發把樹都砍光光，去越南也這樣。

在火燒島有認識了一些好朋友，出來後有組織一些什麼會的，現在還會辦慶生會之類的活動，但是現在叫我去就沒辦法了，我的腳不太能走了，所以在比較沒再去了，以前常常去，那時候常常會去看看有沒有什麼需要幫忙的。關於那個白色恐怖補償的問題，就是我提起的，一開始的時候槍斃的有補償，但是被不當監禁的人沒有補償。於是我就提議發動連署抗議，那時候很多人沒有工作，生活十分辛苦，特別是那些外省的受害者。發動這個白色恐怖的補償，大家都很自動，因為和自己有利害關係嘛！

後來這個補償案成功了，好在有李登輝總統，臺灣人當總統。立法院很多立法委員也都贊成，這個法案如果立法院不贊成，一切就沒辦法了，但是那時候不管本省外省的委員都贊成，全部的補償金額大約十九億，受害者分了一點錢，救了很多人的命。白色恐怖的受害者出來之後都各人顧各人，散在全島，高山族也有，也有死掉了的，現在剩不到一半的人。

我現在 91 歲了，可能再一兩年就死了，我們的會員有一個最老的 94 歲，前不久過世了，我的朋友林麗南<sup>20</sup>現在是最老的<sup>21</sup>，我排第二，我們就要被淘汰了，現在就看你們的了。我現在看到公民（黨）這種出來了，他們不只是一個人，也不是有錢人，也不是像早先黃信介他們組黨，他們這些什麼都沒有，有

<sup>20</sup> 林麗南，嘉義人，1922 年生。太平公學校畢業，臺北工業學校機械科畢業。進臺灣總督府專賣局，1950 年 5 月 13 日在專賣總局被補，送保密局南所，一個月後送高砂鐵工廠，之後再移送綠島，分在第二大隊第五中隊，1962 年 7 月 10 日才保釋出獄。創設建華鐵工廠，之後與日商合資臺灣內田公司，任第二屆董事長，後與西德合作力士樂內田油壓機公司，並曾擔任臺灣空油壓機器工業公會常務理事。參閱自林麗南口述；沈懷玉訪問，鐘玉霞紀錄，〈林麗南先生訪問紀錄〉，收錄呂芳上主持，《戒嚴時期臺北地區政治案件相關人士口述歷史（上）》（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99 年 9 月），頁 41-48。

<sup>21</sup> 林義旭先生說他不喜歡錄影，這樣會招來麻煩。國民黨剛來臺灣的時候就是這樣，國民黨來臺灣，跟日本時代一樣，聽到天皇的時候都要敬禮的那種時代，都是威權統治，國民黨默默的把你抓走你也不知道。你們（按：指訪談人員）走了以後，麻煩會慢慢的來，跟你們反應，你們也沒辦法，政治就是可怕。林麗南就是不喜歡被錄影訪問，他後來賺了大錢，投資股票賺很多錢，事業做很大。

沒有我也是不知道啦！但看起來好像沒有，但是他們動員一下就有 30 萬人，民進黨才 20 萬人，臺灣還有希望，就靠你們年輕人了，臺灣還有希望。



圖1 林義旭於綠島時照



圖2 攝於綠島（1959年12月）



圖3 左一為林義旭，攝於綠島監禁時期，陳孟和拍攝。



圖4 林義旭教學所使用之鋼琴（2014）



圖5 參加新生足球賽獲冠軍，前排右四為林義旭（1958年3月30日）

資料來源：翻攝自呂芳上主持《戒嚴時期臺北地區政治案件相關人士口述歷史》，頁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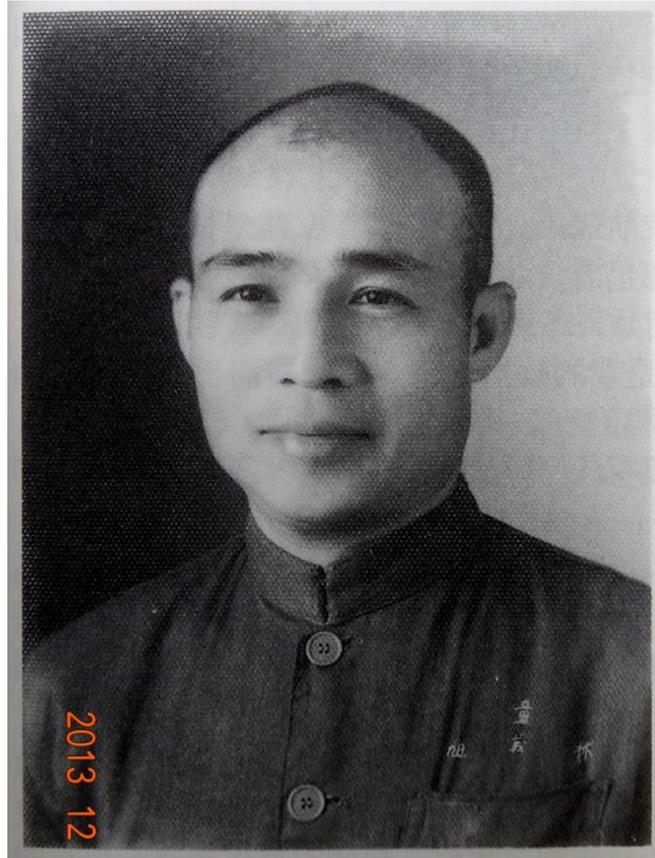


圖6 林義旭38歲生日紀念照（1960）

資料來源：翻攝自呂芳上主持，《戒嚴時期臺北地區政治案件相關人士口述歷史》，頁20。



圖7 新生訓導處二屆運動會球類優勝紀念，前排右四為林義旭

資料來源：翻攝自呂芳上主持，《戒嚴時期臺北地區政治案件相關人士口述歷史》，頁20。